

从托尼·莫里森作品看美国黑人精神生态

吴文权

(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宿州 234000)

摘要: 精神生态研究主要是关注人自身“精神圈”这一内自然的生态平衡,并探索精神生态失衡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三部作品中,托尼·莫里森塑造了美国黑人社会一系列悲剧人物形象,悲剧的因素包括“黑人性”的丧失与母爱的扭曲: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社区在白人强势文化面前迷失自我,丢弃“黑人性”,酿成了佩科拉一家的悲剧;在《秀拉》中,秀拉抛弃“黑人性”,蔑视黑人传统,给黑人社区带来了灾难;《宠儿》中塞丝杀死亲生女儿,《秀拉》中伊娃杀死深爱的儿子,都是扭曲的母爱带来的毁灭。如此种种,都折射出美国黑人精神生态的危机状况。

关键词: 精神生态; 托尼·莫里森; “黑人性”; 母爱扭曲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3)04-0335-04

On American Black's Spiritual Ecology from Toni Morrison's Writings

Wu Wenq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Spiritual ecological studies mainly concern the inner spiritual balance of human beings, and probe in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which cause the imbalance of spiritual ecology. In her *The bluest eye*, *Sula*, *Beloved*, Toni Morrison shapes a series of tragic characters of American black people. When confronting white-dominant culture, the black characters in *The bluest eye* belittle themselves and abandon Negritude, which causes harm to Pecola. *Sula* discards Negritude and shows contempt to black traditions, which bring about disasters to the black community. Sethe kills her own daughter and Eva murders his son, both of which result from twisted maternal love. All the above tragedies reflect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American black people.

Key words: spiritual ecology; Toni Morrison; Negritude; twisted maternal love

对于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关注,是伴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态运动逐渐展开的。1972年,美国生态学者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走向精神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一书中提出应科学地平衡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从人类自

身的角度对精神和生态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与探索,把抽象的精神与生态相联系起来^[1]。中国学者鲁枢元认为,地球生态系统中不仅仅有“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还有“精神圈”,一个以人的思维、判断、理想、信仰、感悟、想象、友

收稿日期: 2013-01-07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SK2012B486)

作者简介: 吴文权(1971-),男,讲师。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西方文化研究。E-mail: ahwenwu@163.com

爱、同情、意向、憧憬为内涵的“圈”,也同样遭受环境污染的侵袭^[2]。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一起构成生态批评的三维,其研究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关注人自身“精神圈”这一内自然的生态平衡,并探索精神生态失衡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其实,不仅仅是生态主义者和生态学者在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生态状况,肩负着社会使命的文学家往往更是站在时代前沿,通过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把脉人类自身的精神生态危机,给人类敲响警钟。如同蕾切尔·卡逊曾经以《寂静的春天》一书带给了人们对自然生态危机的强烈震撼,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用自己的作品展现了美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精神生态危机,同样令人震惊。本文以她的《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三部作品文本为例,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随着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拓宽,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从精神生态视角着手莫里森作品的研究。王守仁等学者在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中较早探讨了白人文化对黑人心灵的戕害。焦小婷认为,莫里森的作品“旨在挖出美国黑人女性精神生态危机的病灶——社会、文化根源所在,并为那些备受精神磨难的美黑人女性找到那一片精神的栖息地”^[3]。洪增流、姚学丽接受了杜波伊斯(W. DuBois)有关黑人灵魂二重性的观点,指出莫里森的作品是为灵魂分裂的黑人在美国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4]。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具体作品进一步分析悲剧黑人形象背后的精神生态失衡因素,即“黑人性”的丧失与母爱的扭曲。

一、“黑人性”的丧失

“黑人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在巴黎求学的一批法属殖民地学生创办了《黑人大学生》杂志,为黑人知识分子提供思想交流论坛,掀起了一场以“黑人性”为主题的政治文化运动。“黑人性”由来自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提出,影响深远,其最大特点是“竭力维护和提高黑民族的尊严,提升他们的生存价值”^[5]。“黑人性”探讨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黑人的种族身份、文化遗产、民族自决、自尊自立、民族信心等,正如桑戈尔本人声称的,“黑人性”是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然而,在美国黑人的历史变迁中,以宣扬自身种族优越性的白人文化强势渗透到黑人社区,“黑人性”

正在逐渐丧失。托尼·莫里森的作品诠释了这一点。

莫里森的小说大多悲剧色彩浓厚,从不同侧面展示美国黑人在社会变迁中无所适从而产生各种精神问题。与前辈作家理查德·莱特、拉尔夫·埃里森等不同,莫里森淡化了美国黑人的政治、经济斗争诉求,更关注黑人在白人强势文化主导下的精神生态危机,其塑造的人物悲剧背后的逻辑是“黑人性”的丧失。

首先,由于“黑人性”的丧失,导致了自卑自贱的种族心里。拿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为例,主人公佩科拉一家耻于自身的黑人文化身份,却又不能被他们崇拜的白人文化接受,悲剧由此产生。佩科拉父亲也曾有过朝气蓬勃的童年,但在第一次和女友发生性爱的时候被白人围观,被迫像动物一样表演,从此自卑于自身的文化标签,一蹶不振,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佩科拉的母亲因为漆黑的肤色、乡下口音、穿着打扮而受到北方妇女嘲笑,在医院分娩时又遭受打击,听到医生说黑人妇女分娩就像动物下崽一样简单,不会疼痛,从此开始憎恶黑人身份。与她的父母相比,佩科拉的悲剧因素是双重的:缺乏爱的家庭环境导致她的认知偏差,认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她没有蓝色的眼睛,这其实是对黑人身份的怀疑;而她周围的社会环境更加剧了她的种族自卑感。无论是去糖果店买糖,还是在学校上课,走在上学的路上,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一步步地把她推向悲剧的深渊。蓝眼睛是白人的文化符号,在佩科拉的眼里,那意味着家庭不再有不幸福,不再遭受他人的歧视。她最终疯了,幻觉中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蓝眼睛,得到了她想要的幸福。总的来说,“佩科拉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文化属性的变异。一方面,她属于黑人群体;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体却仰慕白人价值观。”^[6]

其次,“黑人性”的丧失还造成了自我憎恨的种族情绪。这在小说《秀拉》中得到体现。秀拉本是从小在黑人社区“底层”生活的黑人女性,后来外出到白种人社会上学,十年后归来,“黑人性”丧失殆尽,这注定了她的悲剧。一面是无法改变的黑人种族身份,另一面是影响至深的白人文化思想意识,她的身上承载着两者的冲突,她把对自己种族身份的憎恨转化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使她与黑人社区格格不入。秀拉回来的时候,衣着打扮已经完全“白化”,像一位电影明星,社区的男女老少远远地观望着,显示出秀拉与黑人社区的疏离。秀拉的行

为举止令整个社区的黑人震惊,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自己的奶奶伊娃剑拔弩张,并威胁要烧死她。伊娃是黑人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她的丈夫很早弃她而去,留下一无所有的她和三个孩子。为了养活这几个孩子,她甚至故意让火车轧断一条腿赚取了保险金。然而,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霸占了伊娃的房子,把伊娃送进了养老院,这种做法在黑人社区是史无前例的。黑人社区把她视作恶魔的化身、不详的女人,谁见了她都要遭殃。村里有一位老汉在吃饭时看见她走过,顿时就被鸡骨头卡死了。令黑人社区更不能接受的是,秀拉在性爱方面混乱不堪,镇上所有的妇女都视她为害人精。她不仅和白人男子发生性关系——这让社区的黑人怒不可遏,还轮番与黑人妇女的丈夫们发生关系,睡过一次后就一脚踢开,再也不理了。她对从小要好的朋友奈尔也不放过,最终导致奈尔的家庭破裂,丈夫离家出走。对于塑造夏娃这一恶行累累的人物,曾经有过不少争议,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恶不是异己的力量;它只是不同的力量。这是我在《秀拉》中描写的恶”^[7]。由此可见,莫里森的本意是要表现黑人社区对恶的容忍度。但从个体的角度,秀拉的放纵显示了“黑人性”丧失后黑人灵魂的分裂,是一种精神生态危机。后来,秀拉在孤独中病死了,再以后,这个离“天堂最近”的黑人社区也渐渐解体了。

由此可见,“黑人性”的丧失破坏了黑人固有的精神生态平衡,使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有些学者用“文化身份焦虑(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8]一词来描述这种困惑,并指出:“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不仅导致了美国黑人个人人性的压抑、心理扭曲和畸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黑人社会内部和美国社会白人与黑人社会与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8]。

二、扭曲的母爱

人们常说,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像涓涓溪流,滋润着孩子的心田,为孩子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伴随孩子度过成长期。然而,千百年来被文学家讴歌的母爱在莫里森的笔下却被颠覆了。在这三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两类反常的、扭曲的黑人女性的母爱形象。

第一类扭曲的母爱体现在《最蓝的眼睛》中的两位母亲身上,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于对自己孩子的厌恶而转移了母爱。佩科拉的母亲把对黑

人种族身份的嫌弃投射到女儿身上,她对女儿没有一丝爱,哪怕女儿被亲生父亲强奸后精神趋于崩溃的境地,她依然不闻不问,没有任何关爱和慰藉。与之相对的是,她把满腔的母爱都献给了白人雇主家的女儿,对她疼爱有加,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觉得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在白人家的工作中,白人的女儿是天使,才配拥有爱与幸福。正如有学者指出,“当波利(佩科拉的母亲,作者注)用自己已被白人文化价值观扭曲的视线看不到自己女儿的可爱时,她的情感变得贫乏,责任、道德及亲情可悲地缺席——她的精神被污染了。”^[3]

如果说上述母爱的扭曲是穷人女性的愚昧,作为黑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母爱也是扭曲的。作品中另一名黑人女子杰萝丹,曾上过师范学校,属于黑人社区的中产者。她的生活有条不紊、穿着纹丝不乱、家居一尘不染,但她抛弃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不知道也不会去爱她的丈夫和儿子。她从来不与自己的孩子谈笑逗乐,也不愿意接触自己的孩子。她养了一只猫,对这只猫比对儿子好多了。她喜欢搂抱着猫,轻轻地抚摸着猫,享受着猫带给她奇妙的感觉。对她来说,猫比儿子重要多了,引起儿子对猫的愤恨,最终把它摔死了。无论是对自己女儿异常冷漠的佩科拉的母亲,还是宁愿搂着猫爱抚的杰萝丹,她们扭曲的母爱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和黑人身体有关的一切都是肮脏的、不能忍受的。这种极度的对黑的厌恶导致了对白的变态崇拜,实际上就是对黑人文化的厌弃和对白人文化的崇尚。”^[9]

第二类扭曲的母爱体现在《宠儿》与《秀拉》中,其共同特点是因强烈的母爱而毁灭自己的孩子,血淋淋的令人目不忍睹。《宠儿》是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据她自己透露,该小说立足于黑人历史上一则真实的故事:一位女奴在逃亡路上为了躲避搜捕者的追捕,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莫里森以此为蓝本,成功地塑造了小说中主人公塞丝的形象。塞丝是蓄奴制南方一个叫“甜蜜之家”的种植园女奴隶,她与另外五名男奴隶一起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她决定出逃,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已经获得自由的婆婆家里。但好景不长,奴隶主追踪而来,已经体验到自由滋味的塞丝为了避免孩子重蹈奴役的命运,毅然割断只有两岁的三女儿的喉咙。塞丝杀女被人们视作疯狂的兽行,她也因此坐了18年牢。出狱后,黑人社区仍然无法原谅她,把她看作“食子的巫婆”而孤立她。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居住的房子也经常闹鬼,那

是冤死的女儿来索取母爱,最终化作叫宠儿的女孩与她继续纠缠。黑奴塞丝爱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她对女儿占有式的母爱却妨碍了她对女儿的爱,也扭曲了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感”^[10]。在当时奴隶制的历史环境中,“塞丝的心灵被奴隶制扭曲到把追求理想中的母爱和杀害自己亲生女儿并列等同起来”^[11]。这是极端的母爱,毁灭性的母爱。

在小说《秀拉》中,秀拉的奶奶伊娃对唯一的儿子李子倾注了几乎所有的爱,这份爱让李子小时候死里逃生。李子后来应征入伍,到欧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回到家里。战争给他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他萎靡不振,沉溺于毒品,整天沉默寡言,常常一睡就是几天。伊娃本来对李子满怀希望,打算让他继承所有的财产,但李子的沉沦让伊娃绝望了。于是,伊娃在李子身上浇上汽油,点火烧死了他。“伊娃点的火像她的爱一样矛盾,这火既是在毁灭又是在净化”。^[12]伊娃希望儿子凤凰涅槃,获得重生,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扭曲的母爱在命运面前抗争的悲剧。

莫里森在作品里塑造了众多心理扭曲的母爱形象,反映了黑人女性在种族、性别、文化等多重重压下精神生态的危机,“揭示出种族政治所带来的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时遭遇的挫折和压迫,个体与整个不合理的社会机构、体制和秩序不可缓和的冲突及黑、白文化难以愈合的断裂”^[13]。

三、结束语

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给她的理由是:因其在富于想象力和诗意特征的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美国现实的本质。确实,莫里森通过自己的小说让世界了解到美国社会一个特殊阶层的精神状况。莫里森以一名黑人女性的细腻、敏感,把脉黑人的精神困境,深刻地揭示了种种悲剧背后的社会、文化等原因。无论是佩科拉的悲剧,塞丝的悲剧,还是秀拉的悲剧,都折射出美国黑人精神生态的危机状况。黑人社区在白人强势文化面前迷失自我,丢弃“黑人性”,酿成了佩科拉一家的悲剧。秀拉抛弃“黑人性”,蔑视黑人传统,给黑人社区带来了灾难。塞丝杀死自己的女儿,伊娃杀死深爱的儿子,佩科拉疯了,都是扭曲的母爱带来的毁灭。

作为一名黑人作家,莫里森走出前辈作家政治、

经济斗争的叙事,专注于展现变动的美国社会环境下黑人种族的精神生态状况,大大地提高了黑人文学的影响力和黑人文化的渗透力。虽然她的作品展示了许多悲剧人物和悲情故事,但她并不悲观。如果读者细心关注作品中悲剧发生的背景就会发现,这些悲剧多是在黑人脱离黑人社区后发生的(佩科拉一家从南方搬到北方洛林地区,秀拉是离开“底层”后发生质变的),这似乎给我们一个暗示:黑人要想重获精神生态的平衡,回归“黑人性”方是出路。

参考文献:

- [1] 刘文良. 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 生态批评不可忽视的维度[J]. 理论与改革, 2009(2): 95-98.
- [2] 鲁枢元. 人类纪的文学使命: 修补精神圈[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22(2): 90-93.
- [3] 焦小婷. 寻找精神的栖息地——托尼·莫里森小说女性人物精神生态困境阐释[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40-44.
- [4] 洪增流, 姚学丽. 为分裂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宗教思想[J]. 国外文学, 2008(1): 91-96.
- [5] 赵纪萍. “黑人妇女文学之母”赫斯顿小说的“黑人性”特征[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9(5): 60-63.
- [6] 孙文娟. 迷失与探索——评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J].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07, 24(4): 76-78.
- [7] 王守仁, 吴信云. 性别·种族·文化: 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8.
- [8] 张立新. 难言之痛——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黑人文化身份焦虑与自我憎恨[J]. 山东外语教学, 2008(3): 89-95.
- [9] 张宏薇. 《最蓝的眼睛》的文化透视[J]. 外语学刊, 2008(5): 139-142.
- [10] 徐国伟. 浅谈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母女关系[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6(1): 57-59.
- [11] 高志英, 冯溢. 探索黑人女性心灵世界的重构——评托尼·莫里森小说《宠儿》[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2(6): 94-97.
- [12] Rigney B H. The Voice of Toni Morrison[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3.
- [13] 焦小婷. 身体的残缺与文化断裂[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12(5): 51-55.